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的 报刊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郑保卫 尹延永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大革命时期曾担任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主编。他凭借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报刊活动经历,为党的革命事业和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运用报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坚强的舆论阵地,积累了宝贵的报刊工作经验,同时也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报刊活动;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G206;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1-0111-10
DOI:10.19480/j.cnki.cmgc.2023.01.005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事业和报刊工作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其革命活动与报刊活动息息相关,可以说报刊活动伴随着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五四运动时期,他先后参与编辑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等激进刊物,为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鼓与呼;1920年10月,他作为《晨报》和《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苏俄采访,开创了我国新闻界报道苏俄革命和建设之新纪元;1923年回国后,他先后主编《新青年》《前锋》《向导》《热血日报》等党的主要机关刊物,为党的早期报刊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运用报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坚强的舆论阵地,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同时也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

【作者简介】郑保卫,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尹延永,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1921—2021年)”(19ZDA321)的阶段性成果。

一、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报刊活动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一）从“俄专”学生领袖到新闻记者的身份转变

1917年春，瞿秋白到北京求学，8月考入免交学费的俄文专修馆。这期间，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成绩优异，在同龄人中拥有威信。据沈颖回忆，瞿秋白每次考试必是第一或第二名。^①而在其好友郑振铎的回忆中，瞿秋白是他们中的“谋主”，在学生会工作中，尽显其领导天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率领同学到街头演讲，宣传救亡图存、反帝爱国，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展开坚决斗争，尽显其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

1919年7月17日，瞿秋白在《晨报》上发表时评，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他希望各地学生联合会可以“多出书报”并以之为向导，同时要举行“游行演讲”，提出“定期演讲宜永远举行”。^②此时的瞿秋白已认识到报刊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主张报刊要发挥“社会之指导”作用，这是他办报思想的最初表述。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探取各国真情”而刊登启事，拟“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奔赴欧美报道世界各国大势。瞿秋白以精通俄语的优势，以及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期间参与创办《新社会》《人道》期刊的丰富经历顺利受聘，随之以特派记者身份远赴俄国。

1921年2月6日，俄罗斯《消息报》刊登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三人合写的《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文中认为“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③而记者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让“中国人民不再受那些有关俄国情况的虚伪报道的欺骗。我们将向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④

瞿秋白作为一名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记者，在俄罗斯的两年里，进行了大量采访和实地考察。他采访的人物上至高层领导，下至平民百姓，采访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总共写了五六十篇旅俄通讯，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40多篇，约16万字，成为名副其实的“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⑤陈铁建在其《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一书中说：“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⑥

（二）从激进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瞿秋白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士族阶级家庭，经历了新国取代旧朝的时代。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政府腐败和人民受苦的状况，“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⑦瞿秋白在饱受时代变迁和家道中落离散之苦后，于1917年春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前往北京谋求出路。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中国思想界受其影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路。此时还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思想上也开始发生变化。瞿秋白回忆道：“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⑧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瞿秋白思想的影响是庞杂的，他接受了各种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尚处在思考、判断与选择的过程之中。五四运动之前，他已形成一些朦胧的民主思想，但又受老庄哲学和佛学的影响，带有某些“避世”和“厌世”的倾向。五四运动则逐渐打破瞿秋白原有的冷清生活，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⑨但还不知道怎样去医治社会的“无名毒症”，仍持有“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

1920年1月21日，瞿秋白发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且“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⑩这是他首次肯定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同

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预示着他开始摆脱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重大转变,为他远赴俄国、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时社会思潮存在的混乱状况,瞿秋白决心以“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为由,从“整顿思想方法入手”,奔赴俄国去“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等一行人抵达赤塔后,他在空暇时间开始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政党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⑩随后,他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并希望本次赴俄可以“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⑪

瞿秋白抵达莫斯科后,接触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这所“共产主义的实验室”,^⑫他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思想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进而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瞿秋白在其《多余的话》中指出,这时他“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⑬已经不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⑭

(三) 从访俄特派记者到党报党刊主编的岗位转变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踏上回国返乡行程,结束了他的苏俄之旅。此时,瞿秋白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回国后看到的中国是“狗彘食人的中国”,民国政府“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⑮于是,他拒绝了政府外交部的高薪工作,愉快地接受了陈独秀给他安排的党的宣传工作任务,决心成为一名革命者。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受到打击而转入低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瞿秋白也跟随中央机关到上海工作。瞿秋白的主要工作是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这三大中央刊物在当时有明确分工,《新青年》是中央理论刊物,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前锋》是中央政治经济刊物,负责经济评论;《向导》作为中央政治机关报,侧重于政治评论。但由于时局影响和编辑部门自身条件的限制,三大报刊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分工。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上海问世,时隔半个月《前锋》月刊于1923年7月1日正式在上海创刊,瞿秋白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刊主编。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五卅事件,并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担任主编。1927年4月,因工作需要,他又临危受命负责主编《向导》周报。瞿秋白从一名普通驻外记者成长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主编,为建党初期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 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领导者的职位转变

据瞿秋白回忆,他在俄罗斯经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5月加入俄共(布)党组织,同年9月在东方大学任翻译和助教时转为正式党员,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21日,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翻译工作。

1923年6月,瞿秋白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且担负起草党的纲领草案的工作。在会上,他就国共合作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参加国民党”,且应“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1923年10月,瞿秋白以鲍罗廷^⑯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参与草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等重要文件,并经常与鲍罗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会议。当月25日,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瞿秋白被补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由此进入国共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瞿秋白与李达、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此次大会。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开始参与国民党工作,并以此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

指导工作。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瞿秋白担任11个重要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并就国共合作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发言。此次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⑧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中央局领导机构,并担任宣传委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三个月后在武汉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其又被指定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回忆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⑨

二、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报刊活动的主要经历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报刊活动的主要经历包括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政治经济刊物《前锋》月刊、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创办中共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等。

(一) 主编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15日,《新青年》季刊在瞿秋白精心设计和编排后正式出版。^⑩该刊的封面和刊名都由瞿秋白亲自设计和题写,创刊号为“共产国际号”。这一期共刊登14篇文章,其中瞿秋白的就有6篇,加上其翻译的《国际歌》和创作的《赤潮曲》两篇歌词,刊物一共刊登了16篇作品。

瞿秋白在作为发刊词的首篇文章《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对《新青年》季刊的性质、地位和职能作出明确定位,指出《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已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其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在军阀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背景下,瞿秋白对《新青年》季刊提出了“五当”重任:一是“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二是“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三是“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四是“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五是“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⑪以求继续“思想革命”事业,引导革命运动,实现“共产大同”。

《新青年》季刊共出版9期,发表124篇文章,第4期后改为不定期出版。该刊的第3期和第4期分别由陈独秀和彭述之主编,瞿秋白共主编了7期。《新青年》季刊作为党的理论刊物,注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讨论中国革命中的理论问题。瞿秋白就先后主编《共产国际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三个专号,系统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与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实地考察俄国革命、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历密切相关。

与前期的《新青年》相比,《新青年》季刊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刊登了许多为革命宣传服务的诗词歌曲和广告。在其发表的诗词歌曲中,有瞿秋白的《国际歌》《赤潮曲》《过去》,以及文虎译的《进行曲》等。该刊发表的广告约有22版,多数是革命报刊、著作和上海书店的广告,如《向导》周报、俄国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的ABC》的广告。这些宣传有助于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了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深远影响。

(二) 主编中央政治经济刊物《前锋》月刊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其中心议题是讨论是否与国民党合作、如何与国民党展开合作、怎样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是党后续工作的重心,也是党后续宣传工作

的前提。大会最终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目标。陈独秀作大会报告，并阐述了党的宣传工作任务，即“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②这成为会后创办的《前锋》月刊的重要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3年7月1日《前锋》月刊在上海正式创刊，由瞿秋白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向警予、张太雷、毛泽民、刘仁静等。《前锋》月刊为16开本，本计划为月刊，但受当时时局、经费、人员、投稿等限制，拖期严重，到第二期出版时已是12月1日，第三期拖期一个月，于1924年2月1日出版，这也是最后一期。

《前锋》作为中央政治经济机关刊物，其作用是“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③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强调，党的革命工作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任务；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④在中国饱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下，“国民运动是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而《前锋》“只愿意当先锋，只顾打头阵”。^⑤宣传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自然成为《前锋》月刊的责任和工作。

《前锋》共出版3期，刊登文章28篇，其中瞿秋白有6篇。《前锋》虽然只存在不到一年时间，但其特色十分鲜明。尤其是该刊所设的“寸铁”专栏，以发表短小时评为主，3期共刊登30篇短文，其中瞿秋白有12篇。虽然《前锋》“因人力不足”而停刊，但“寸铁”专栏却成为中央理论刊物的一个特设栏目。后来创办的《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布尔塞维克》都曾开设“寸铁”专栏，^⑥其对“寸铁”栏目的持续经营及话语模式的不断运用，使得“‘寸铁’逐步被打上中共的标识”。^⑦

（三）主编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报。该报前后有3位主编，第一任主编由中央委员兼负责宣传工作的蔡和森担任。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离职，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兼任，但因其伤寒住院并未负责具体编辑事务，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成为《向导》的实际负责人。^⑧1927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担任《向导》的第三任主编。此时《向导》周报编辑部已随中共中央迁往武汉，同年7月《向导》周报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自创刊到被迫停刊，期间开辟了“寸铁”“读者之声”“时事短评”“各地通讯”“中国一周”“世界一周”等专栏，主要宣传党的主张，力求反映革命现实状况、指导革命工作，做国民革命的“向导”。其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陈独秀虽未担任《向导》主编，但是他为《向导》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并制定该报的编辑方针。可以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自始至终对《向导》起到了指导作用。

1927年4月，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派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同时兼任《向导》周报主编。《向导》周报共出版201期，每期16开本一册，每册8到12页，刊登文章达到1474篇，累计346万字，在创刊初期“发行2000份，不久增加到4000份，两年后每期销售2万余份，到1926年7月又增到5万份以上，迁至革命中心武汉以后，每期销近10万份”。^⑨由此可见，《向导》周报在瞿秋白全面接管后取得了显著成绩。《向导》周报贯穿大革命时期始终，从创刊到被迫停刊的5年中，其真实记录了党在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中的整个历程。

（四）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31日，成立了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为了向广大民众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及帝国主义在华犯下的罪行，打破帝国主义对消息的封锁、歪曲，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利用报刊宣传及时指导运动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党中央决定立即出版一份日报。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创刊,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主编为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为编委会成员。瞿秋白题写报头并撰写《发刊词》。该报每期四版,开设有“外人铁蹄下的上海”“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紧要消息”“舆论之制裁”等专栏和副刊“呼声”,所刊载的内容主要包括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行为和阴谋、宣传报道全国各行各业工人罢工行动等。

瞿秋白在询问工人是否看《热血日报》时,工人答道:“这报好,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报纸,处处为我们工人说话。”^⑳工人对《热血日报》的认可,源自它是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喉舌”,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瞿秋白在发刊词中说:“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这要“引起全国人的热血”,而这“热的血”就是为了“得着冷的铁”,得着“武器的批判”。

瞿秋白除参与《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之外,还撰写评论时局、指导斗争的政论文章。这期间,他共撰写社论、时评21篇,杂感、小言23篇,并经常撰写一二百字的记者按语。^㉑《热血日报》自第三期起开设“小言”专栏,主要刊登短小的评论文章。瞿秋白先后以“热”“血”“沸”“腾”“了”“顾”“默”等署名发表了37篇短评。

1925年6月27日,《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共刊出24期。该报作为指导五卅革命运动的报纸,具有鲜明的斗争性、鼓动性和引导性,其体裁丰富多样,文字通俗易懂。该报虽然仅仅出版了20多天,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工人群众积极订阅和投稿,出版至第10期时,“销数即达3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热血日报》的创办和发行,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瞿秋白创办和主编革命报刊指导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大革命时期瞿秋白报刊活动的历史贡献

大革命时期是瞿秋白办报实践最为丰富、办报思想逐步成熟的关键时期,因此成为其一生报刊活动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报刊活动在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丰富充实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致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宣传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思想

瞿秋白一贯主张“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㉒他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23年6月,瞿秋白在《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一文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合理性。此外,他发表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新青年〉之新宣言》《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章,明确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㉓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因没有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使党的领导处于被动地位。瞿秋白在其《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分析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与农民、小商行、军阀派、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随后,他又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多篇文章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需要在统一战线中居于领袖地位。姚守中、马光仁在《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的开拓者”。^㉔

2. 宣传统一战线的思想

党的“三大”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方针,但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还存在分歧和争论。

如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戴季陶主义者”，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其先后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一文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极力反对和破坏统一战线战略。

瞿秋白则极力支持并宣传统一战线策略，认为无产阶级应该争取革命的“指导权”。他在《向导》发文，批判戴季陶意图“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⑤并指出，“戴季陶主义者”企图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来愚弄民众，最终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⑥瞿秋白所作的批判和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⑦

1925年，瞿秋白先后在《热血日报》《向导》等报刊发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等一系列文章，倡导“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⑧为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宣传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思想

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3年5月，他在《向导》周报发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指出解决革命的办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⑨在党的成立到国共合作的几年时间里，党内同志一直未把武装斗争放在重要位置，致使党在革命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才逐渐认识到要完成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同年8月，瞿秋白在《向导》发文指出，五卅运动未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阐述了无产阶级拥有自己武装的重要性。1926年1月，他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改译）》一文，指出只有巩固革命势力大同盟，组织国民的武装势力，革命才能胜利，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能成立，^⑩再一次倡导唯有武装斗争才能掌握革命的主动性，才能实现人民利益的主导权。随后，他又在《新青年》和《向导》发表《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等文章，阐述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关键，并全面分析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二）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

1922年底，瞿秋白从苏联回到祖国。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指出：“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⑪当时，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员很少，亟需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正是在此背景下，瞿秋白前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热血日报》等党的报刊，主要负责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在这期间，瞿秋白努力开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旗帜。

1920年时，《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其中心任务只是从“文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还无法完全切断与原来同人的关系”，并未完全成为党的理论刊物。^⑫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在同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新青年》季刊被界定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这说明改版后其已完全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的理论刊物。

《新青年》季刊（后为不定期期刊）从1923年创刊到1926年终刊，一共出版了9期。瞿秋白专门开设“共产国际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集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译文40篇，占总篇幅的34%。^⑬这些译文大多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辩证法与逻辑》《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专政问题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等。

此外，该刊还刊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文章，如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自

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等，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郑超麟的《列宁与职工运动》等。这些译著和理论文章对提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参与领导的《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几家报刊相互配合，共同筑起了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肩负起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使命，有效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大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

（三）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党报党刊能够发挥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④“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⑤这说明集中力量办好党的政治机关报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尤为重要。

瞿秋白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在俄国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洗礼，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把自己“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这是其正式步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开始，也是其立志“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的开始。

作为建党初期党内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需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引导。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⑥且无产阶级“自然处于革命的领袖的地位”。^⑦这是其第一次明确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

瞿秋白认识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解决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的论断。其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利用报刊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 and 斗争经验。如1925年五卅运动中，瞿秋白把《热血日报》《新青年》《向导》作为党的舆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及时提出斗争策略和方针，推动了运动的发展。1926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并强调“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⑧突显武装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北伐战争伊始，针对党内关于国民革命军领导权问题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瞿秋白在《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中提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现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认为领袖权之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紧要关键”。

瞿秋白作为党内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革命斗争的指导者，利用自己作为党报党刊负责人的独特优势，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分析革命的现状与走势，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在当时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思想

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忠实的践行者和发展者。其积极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利用自己的理论特长，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政策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办报的原则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报思想，同时也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

党的报刊之使命是指导思想和武装民众。马克思指出，报刊是社会的捍卫者，是当权者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维护人民自由的喉舌。^⑨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季刊时，就认识到党报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即能够担负起革命宣传的伟大使命。他认为《新青年》季刊作为党的机关报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先驱，其职责使命就是给“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给“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

党的报刊应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决定党的报刊拥有与生俱来的革命色彩。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革命的领袖，《新青年》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处于和旧的宗法社会思想的斗争之中，处于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的斗争之中，“不

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⁵⁰

党的报刊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季刊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这是瞿秋白一个重要的新闻观点，是其“首次对党的报刊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也是“我党对报刊作用的最早表述”。⁵¹瞿秋白极为重视党报党刊的导向作用。五四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依赖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妥协，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而《新青年》季刊继承“旧时”《新青年》之志，成为中国革命的向导，“进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⁵²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此时还很“幼稚”，《新青年》季刊虽力弱但需担重任。其领导《向导》周刊工作时，更是把指导斗争、引导民众作为报刊的神圣使命。

党的报刊要注重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党的报刊自然也应为捍卫劳苦大众利益的喉舌，因此群众性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五卅运动时期，瞿秋白在主编《热血日报》时，非常注重关注群众情绪，重视群众需求和喜好。为使党的政策主张让工人群众所接受，瞿秋白除自己深入工人进行调研、直接倾听其诉求之外，还安排记者采访汇报，同时组织“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⁵³以满足群众多样化要求。瞿秋白在编辑《热血日报》时，格外关注工人对文章的接受力和认同感，以便工人能够读懂和接受报纸。他要求编辑文字须力求通俗易懂，篇幅短小精悍，立场鲜明，具有很强的鼓动性。瞿秋白曾感叹，这种把报刊作为宣传工具，比在大学讲课要有效得多。

党的报刊要讲求策略性和斗争性。瞿秋白指出：“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都要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⁵⁴为此，其在报刊宣传工作中特别注重策略性和斗争性，并有计划、有目的地开辟各类专栏，如在《新青年》季刊开辟“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世界革命号”等；在《向导》《前锋》设有“寸铁”专栏；在《热血日报》开设的专栏更加丰富，如“外人铁蹄下的上海”“国内要闻”“国外要闻”“紧要消息”等，以此强化宣传与斗争的效果。尤其是《热血日报》开设的“罢市罢工消息汇志”栏目，及时报道各地工人运动情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抨击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利益的《字林西报》《大陆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对革命斗争的歪曲，形成很好的效果。《热血日报》虽仅仅出了24期，但其立场坚定、语言犀利，勇于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表现出鲜明的斗争性。❏

（责任编辑：颜云霞）

参考文献：

- ①《忆秋白》编辑小组. 忆秋白[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5.
- ②③④⑩⑫⑬⑭⑯⑰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73，3，55，165-166，700，410，696-697，8-11，7-8，11.
- ⑤陈铁健. 瞿秋白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37-138.
- ⑥④陈铁健. 从书生到领袖 瞿秋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7，225.
- ⑦⑨⑪⑬⑮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3，25，82，93，213.
- ⑧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94.
- ⑰鲍罗廷时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
- 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M]. 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119.
- ⑳张树军. 图文中国共产党纪事（1919—1931）[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121.
- ㉑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16.
- ㉒㉓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3，277，243.
- ㉕本报露布[J]. 前锋，1923（01）.
- ㉖㉗周良书，袁超乘.“寸铁”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J]. 历史研究，2021（03）：34-55，34-55.
- ㉘郑超麟. 我与《向导》周刊[J]. 新闻研究资料，1993（01）：160.

- ②⑨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24-125.
- ③⑩杨金达.瞿秋白的故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92.
- ③①⑤①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58,106.
- ③②③④陈铁健.瞿秋白研究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1,86.
- ③⑤③⑥③⑦③⑧④⑩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3-324,325,338,314,412.
- ③⑨④⑦⑤⑩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9,9.
- ④②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9(03):82-104+191.
- ④③葛开勇.1923—1926年《新青年》与苏联文献翻译[J].红广角,2018(06):94-101.
- ④④④⑤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9,173.
- ④⑥④⑧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7,59+61.
- ④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 ⑤③杨之华.回忆秋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

Qu Qiubai's Newspaper Activities and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Zheng Baowei, Yin Yanyong

Abstract: Qu Qiubai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ctivist and theoretical propagandis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central organ of the CPC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cause and news propaganda by virtue of his profound Marxist theory cultivation and rich experience in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activities.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Qu Qiubai actively propagated the policie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 CPC by us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nthusiastically spread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 and correctly guided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He built a strong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for the CPC,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newspaper work, and enriched the experience in running newspapers and news thoughts of the CPC.

Keywords: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Qu Qiubai, newspaper activitie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